

# 『唐宋变革』论

## 的由来与发展



李华瑞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人才强教项目资助

#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



李华瑞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 / 李华瑞主编.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80696-857-4

I. ①唐…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唐代②中国—古代史—研究—宋代 IV. ①K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6571号

---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

李华瑞/主编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mailto:tjgj@tjabc.net)

三河市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43.75 字数560千字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857-4

定价: 110.00元

PDG

#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

## (代绪论)

李华瑞

进入 21 世纪,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 20 世纪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何谓“唐宋变革”?“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是谁?唐宋变革期的起始如何界定?如何看待唐宋社会性质等等,迄今仍有很大争议。纵观 20 世纪以来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是因缺乏学术史的梳理,才导致众说纷纭现象的出现。所以,搞清唐宋变革论的由来和发展对于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乃至客观评价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很有必要。

实际上,对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讨论有两条主线索,一是从南宋以来迄 20 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唐宋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 20 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先生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演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 20 世纪国内唐宋史研究领域基本是泾渭分明,只是进入 20 世纪后“唐宋变革”才与唐宋变动或变化相混淆,两条线索才绾结在一起,出现泛化的倾向。下面就这两条线索的由来和发展变化分成四个方面进行简要梳理。

### 一、南宋以来中国学者对唐宋之际历史变动的认识

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的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

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sup>①</sup>“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对于这种变动从南宋初期就已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段名言言简意赅,不是枝枝节节的史料,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论<sup>②</sup>。南宋末年文天祥亦曾感慨:“自魏晋以来至唐最尚门阀,故以谱牒为重,近世此事寝废,予每为之浩叹。”“族谱昉于欧阳,继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原其所以,盖由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往往而是,虽坡公(苏轼)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乡之说也。”<sup>③</sup>从文天祥的语气来看,在这里所讲的“中世”显系指的即是唐中叶时社会发生了巨变。明朝人陈邦瞻更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待唐宋之际的大变动,而且把中国历史分作三个阶段。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序》中说:“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sup>④</sup>不论是南宋学者敏锐的观察到唐宋之际的大变动,还是明代陈邦瞻的中国历史三阶段说,都是“本土”学者的独立思考,或者说是地道的中国式的“历史分期”。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分期则不能不打上西学的“历史分期”方法的烙印。西学的历史分期方法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按“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划分历史的方法。1917年,傅斯年先生说:“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者,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虽史

① 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湾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

② 参见张邦桢《“唐宋变革论”的首倡及其它》,《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③ 文天祥《文山集》卷十四《跋吴氏族谱》《跋李氏谱》。

④ 从分期角度引述这段序言的似首见于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第1期,第12—131页。

家著书,小有出入,大体固无殊也。……日本桑原鹭藏《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说以分中国历史为四期。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可见20世纪初期西学分期方法在国内影响甚巨。但对于照搬西洋历史分期法而不顾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做法,也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而提出新的分期方案。首先,傅斯年不同意桑原鹭藏以汉族盛衰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桑原鹭藏分中国历史为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满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傅斯年以为:“所谓汉族最盛时代、蒙古族最盛时代,欧人东渐时代者,皆远东历史之分期法,非中国历史之分期法。”因而他以汉族之变化与升降为上世中世近世分期之标准,将中国历史分为四期。

上世:从周平王元年(前770)以前至南北朝陈祯明三年(589),其间又分为四期;

中世:起隋开皇九年(589)至南宋祥兴二年(1279),其间又分为二期;

近世:起南宋祥兴二年(1279)至晚清宣统三年(1911),其间又分为三期;

现世:民国建元以来。

傅斯年先生在“宜知唐宋两代有汉胡消长之迹南宋之亡又为中国历史一大关键”一节中论唐宋历史特点时指出,自隋迄宋,为第二中国,“此八百年中,虽为一线相承,而风俗未尝无变。自隋至于唐季,胡运方盛,当时风俗政教,汉胡相杂,虽年世愈后,胡气愈少,要之胡气未能尽灭。读唐世文家所载,说部所传,当知愚言之不妄也。至于周宋,胡气渐消,以至于无有。宋三百年间,尽是汉风。此其所以异于前代者也。就统绪相承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说明之曰‘第二中国’,上与周汉魏晋江右之中国,对待分别可也。此‘第二中国’者,至于靖康而丧其中原,犹晋之永嘉,至于祥兴而丧其江表,犹陈之祯明。祥兴之亡,第二中国随之俱亡,自此以后全为胡虏之运,虽其间明代光复故物,而为运终不长

矣。祥兴于中国历史位置,尤重于祯明。诚汉族升降一大关键也”<sup>①</sup>。以种族、民族盛衰、升降作为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标准是20世纪初期历史分期的一大特色。

雷海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sup>②</sup>显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在雷先生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383—959)是一个大的过渡,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三百年间是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

二是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20世纪50—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也有多种标准和划分方法。分期标准:以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作为分期标准;以阶级斗争的发展作为分期的标准;以封建国家政权的发展变化作为分期标准;以生产方式的变化作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线索作为分期的标准;以综合考察历史的多方面因素作为分期的标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发展作为分期的标准。

具体划分:由于分期标准认识不同,也由于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意见分歧,因而对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具体划分,主张很不一致,大约有五种划分。二分法:隋唐五代以前为上行阶段,北宋以后为下行阶段,或称作上升期和下降期,或称作前后期,此说以“战国封建说”为主,“西周封建说”则主张西周至战国为

<sup>①</sup>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1918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60页。

<sup>②</sup> 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2卷第1期,1936年。

一期,战国至鸦片战争前为一期;三分法:“西周封建说”将西周至秦统一为前一阶段,或称前期,中期为秦统一至元末,明清为封建社会后期。“战国封建说”,以黄巾、黄巢起义划分为三阶段,战国、秦汉为封建制度确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阶段,魏晋隋唐是庄园农奴制阶段,宋元明清是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朱绍侯主编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分作三个时期,一是确立时期,从战国到西汉以前,发展时期是西汉到唐以前,三是繁荣时期,从唐至清,民族进一步融合,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元的大统一、明代专制主义、资本主义萌芽,清代统一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四分法:早期、成长期、发展期和晚期,或称作形成期、发展时期、螺旋式发展时期和逐步解体时期,也有称作一二三四阶段的。战国、秦、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初,明末清初到鸦片战争前。五分法:《中国历史》初中课本,战国秦汉,形成和初步发展;三国魏晋南北朝分裂和民族融合;隋唐封建繁荣;辽宋夏金元封建继续发展民族融合;明清封建制度逐渐衰落;六分法:《中国史纲要》西周秦汉封建开端;秦汉封建统一国家形成;三国魏晋南北朝,北方封建割据,南方封建经济发展;封建向上、重建时期,隋唐;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民族矛盾扩大,五代十国宋辽金元;封建经济高度发展专制主义进一步强化及其走向衰败时期,明清<sup>①</sup>。

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与中国古代史分期略有不同的是,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中轴,此前一般认为宋朝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或称为下行阶段、下降期的开始,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sup>②</sup>。也就是说宋代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开始,是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同时还认为唐朝和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朝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变化。除此之外,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起始上有不同的看法,即有以隋朝建立、安

<sup>①</sup> 瞿林东《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不同见解》,肖黎主编《20 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sup>②</sup> 比较有代表性的以侯外庐在 1959 年接连发表两篇论文:一篇是《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作为第一章刊载于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另一篇是《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

史之乱、两税法颁行、唐末农民战争、北宋建立等断限<sup>①</sup>。此后随着对于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的渐次展开,对过去的成说予以矫正,学者们认为宋代不仅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开始,而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如邓广铭先生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sup>②</sup>朱瑞熙认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五代十国、两宋、元代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八百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发展变化,到宋代几乎完全定型,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sup>③</sup>。叶坦认为:“宋代是中国封建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并简要地论述了两宋的时代特征<sup>④</sup>。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首章即以《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问题》,作为本书的代绪论。在这篇代绪论中,漆侠先生将中国封建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战国秦汉时期(前476—184):封建制度建立、封建依附化关系发展阶段”“二、魏晋隋唐时期(184—884):庄园农奴制阶段”“三、宋元明清时期(884—1840):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sup>⑤</sup>。并认为宋代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这种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sup>⑥</sup>。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大框架内,学者们对唐宋之间的社会变迁和变化有种种不尽相同的看法。胡如雷认为,从北宋开始,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发生了显著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继之以“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更把传统的“均贫富”发展为“均田免粮”,为清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了先

---

①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收入《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③ 《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④ 《宋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江海学刊》1990年第5期。

⑤ 《宋代经济史》(上册)《漆侠全集》第三卷,第6页、第14页、第24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河。这些口号说明,虽然多数农民起义仍然打击封建王朝,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10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这件事中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sup>①</sup>。

漆侠先生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比较繁杂的问题,须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他指出:“这个时期的变革虽然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但值得客观注意的是,它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证:(1)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2)在土地私有制居于压倒的优势地位的同时,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也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土地占有新格局之一就是,新兴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逐步爬上社会的极峰。(3)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4)“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5)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6)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对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氛一朝消散,人们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相应程度上得到解脱,这对于一代新人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是完全有利的,说到底,经济领域里的变革,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带来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明的。唐中叶文化思想领域发生变革,其主要变革是:(1)儒佛道三家矛盾斗争及其相互渗透。(2)儒家思想遇到佛道两家的严重挑战。(3)宋儒从宏观上把握经学,而不是从章句上理解经学要旨,使经

<sup>①</sup>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

学研究达到新阶段。宋学不仅与汉学并驾齐驱,而且浸浸乎超而过之<sup>①</sup>。

王曾瑜先生认为:“从中唐至明清的情况看来,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是否有条。一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农民与地主的身份性差别有所缩小。二是雇佣制逐步有所发展。”<sup>②</sup>张邦炜先生在评论王曾瑜先生的《宋朝阶级结构》时说:作者并不一定属于“唐宋变革”论者,可是书中依据大量史实所作出的不少结论,恰恰起到了为“唐宋变革”论张目的作用。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动方面,作者论述了客户、形势户正式作为法定户名以及非官僚地主法定户名的出现这三大历史现象。在非主体阶级方面着重探讨了坊郭户的形成与某些法定贱民的消亡这两大历史过程。表明了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状况的变动及其变化的时代进步意义<sup>③</sup>。

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五代十国、两宋、元代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八百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发展变化,到宋代几乎完全定型,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都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其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奏响了新的战斗乐章。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sup>④</sup>。

张邦炜先生从婚姻的角度“家之婚姻由于谱系”到“不问阀阅”演变的角度,以为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变革,除婚姻制度的变革是明

---

① 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页。

③ 张邦炜《著之即久,其发必厚——读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宋史研究通讯》(总第29期)1997年第1期。

④ 《宋代社会研究》前言,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周宝珠、陈振《简明宋史》绪言亦有相类的论述,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证外,还可以举出若干。诸如科举方面的“取士不问家世”,教育方面的“广开来学之路”,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的从“雅”到“俗”,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宗教画、政治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等等。这些极富于时代感的变化尽管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精神竟如此惊人地相似和一致。他们通通是随着“田制”经济解体之后经济结构的变化、门阀政治崩溃之后等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谐地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生活画卷。所有这些,一概表明,宋代是一个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同时他还认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标志着宋代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sup>①</sup>。

除以上的历史分期外,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键之人物也。”<sup>②</sup>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sup>③</sup>他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更是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先秦以上可说是第一期,秦汉、隋唐是第二期,以下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并称:第三期“可说是中国的近代史”<sup>④</sup>。

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

① 《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183页。

② 《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参见胡戟《汉魏隋唐历史底蕴的初探——历史大势,礼仪制度与士人的追求》,《1997年中国唐史高级研究班,唐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③ 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湾书局1974年版。

④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5页。

“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有唐三百年的大半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大半时间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sup>①</sup>。

几位前贤虽然没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划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迁,但他们从不同角度敏锐地观察到唐宋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

## 二、日本“唐宋变革”论的提出与发展

如前揭,虽然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教科书按西方历史分期法划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主要受日本桑原鹭藏的影响,但是桑原鹭藏对唐宋历史并没有给以特别的关注,或者说没有把唐宋之际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中国历史划时代的重要性来看待。因而从历史分期的角度,日本的另外一位学者内藤虎次郎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对20世纪国际宋史研究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日本秋田县人,40岁以前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07年以后转任京都大学教授、学术带头人,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

过去一般以为内藤湖南是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sup>②</sup>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实际上根据内藤的长子内藤干吉的考证,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和“宋代近世

<sup>①</sup> 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湾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314、350页。

<sup>②</sup> 《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1922年,5200余字。

说”最早形诸文字是在1909年,见于内藤1909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的绪言:“近世史应从什么时代开始,当说是宋代以后。”<sup>①</sup>其后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1920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逐步系统阐述了他的“宋代近世说”<sup>②</sup>。

内藤湖南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实际上即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和“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他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

<sup>①</sup> 《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后记》,第527—530页。

<sup>②</sup> 详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后收入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5页。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另外,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大致受到京都大学教授内田银藏在《日本近世史》(1903年)一书中所提出的“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国文化”观点的影响。详见[日]葭森健介《唐宋变革论于日本成立的背景》,《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的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sup>①</sup>

内藤湖南的关于宋代是中国历史近世开端的假说,经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挥和展开,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近世说在国际唐宋史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是中国的中国史研究可举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这一时代的坐标轴”<sup>②</sup>。

内藤湖南的学生和后继者在两个方面大大发展了他的假说。一是后继者们把他的假说概括为“唐宋变革”。“1945年以前,在这一阶段,内藤自己并没有直接归纳出‘唐宋变革论’这个专门的术语。这一提法,实际是后来的研究者归纳的。也就是说,虽然内藤的时代分期说、他的一些论说中包含有‘唐宋变革’论的内容,但是,这一专门的学术术语并不是他亲自提出的。池田诚发表了《关于唐宋变革的再检讨》<sup>③</sup>,这或是当时比较早归纳出‘唐宋变革’这一术语的论文。”<sup>④</sup>“必须注意的是,通篇论文都没有‘唐宋变革’一语,把它用来简称‘中国

<sup>①</sup>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18页。目前对唐宋变革说的形成、特点、理论发展及定义的阐发最全面和最确切的文章有两篇,一是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二是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总81期),收入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sup>②</sup> 引自张光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第94页。

<sup>③</sup> 《唐宋の变革についての再检讨》,《日本史研究》第24卷,1954年。

<sup>④</sup> 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学术月刊》2006年10月第38卷,10月号。

历史从中古过渡为近世是发生在唐宋之交’的时代观,是后来的事。把这个时代观发扬光大,并正式接受‘唐宋变革’之名作为京都学派的一个主要学说的,当推内藤的弟子宫崎市定(1901—1995)。内藤专攻的断代史其实是清代,宫崎才是宋代,‘最早对于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并不相信,而是从数十年的研究中,达到了和内藤一样的见解……宋代是和唐代完全不同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近世’。尽管两人的重点略有不同,内藤强调唐宋的分野,宫崎进一步阐释宋代所具备的‘近世’特征。”<sup>①</sup>

二是宫崎市定把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指向由内藤湖南偏重讨论其所处的中国现实社会状况的起始,转向侧重讨论按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模式比附中国历史近代的起始。换句话说,内藤湖南虽然使用西方通行的分期方法划分中国历史,但他与当时“将所有的东西全都归结到西洋的‘近代’这一单线的历史观相比,在本质上全然不同”,“‘近世’论的特征在于,并非只重视西洋‘近世’,对日本、中国也设定了这一有着共通时代面貌的‘近世’”。根据多位研究内藤湖南学者的观点可知:“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观察的方法才是内藤史学的活力所在。”内藤的“近世说”不仅仅是就中国历史分期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的,而是与他关注当时中国政治走向以及日本对华政策分不开。即为处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走向开出的“贵族政治→君主独裁政治→共和政治的社会发展趋势”方案服务的。中国的辛亥革命不是从旧体制、落后社会到新体制、先进社会的转换,而是“可以追溯到从唐代中叶到五代、北宋亦即离现在约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间,已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近世纪”。如何保障这种缘于历史“早熟”必然出现的“共和制”呢?内藤提出:“中日共存的方向:即以先进国家日本的经验输入激活中国社会,由此达到国家自立的进程。”<sup>②</sup>可见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不能简单地从学术层面来理解。对此,研究内藤湖南的专家钱婉约指出:“这里提出两个问题,对于唐宋变革论。无论是宋代近世说还是文化中心移动说,都说明内藤学术的社会关注程度和现实干预感相当强烈。……进一步说,

<sup>①</sup>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总81期),收入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sup>②</sup> 以上引文分见[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马彪、胡宝华、张学锋、李济沧译《内藤湖南的世界》,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157页、166页、29页。

内藤湖南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出发点及终极目标,始终在于对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之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这是牵动他情感至深处的毕生理想。研究中国,喜爱中国文化,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日本!因此,我们最终看到,这样一个理解并喜爱中国文化的人,却终于在日本国权扩张主义的时代思潮中,走上了在本质上背叛中国文化的道路。”“‘宋代近世说’貌似一个赞美中国文化光辉灿烂、发达领先的历史理论,但它却是内藤湖南现实的中国观‘国际共管说’的思想依据,是与一个明显具有殖民色彩的对华设想联系在一起。”内藤湖南通过“宋代近世说”“向读者说明:中国文化在进入近代以后已是高度发达的文化”,“但是正是这个‘早熟’的、高度发达的辉煌文明,导致了当前衰老的、政治、经济困难重重,亟待寻求出路的中国,对此内藤提出了所谓“国际共管”的理论<sup>①</sup>。

但不管怎样说,内藤湖南并没有完全把宋以后的中国“近世”视作与西方雷同的近世社会。而他的后继者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内藤湖南“近世说”则如包弼德(Peter Bol)所说是“断言西方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就按照与西方相同的演进阶段在发展,而且这些演进阶段是普遍的”。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sup>②</sup>绪论中说:“一般而言,欧洲的近世史是指文艺复兴以后;但试图否定东洋近代性的论者,却将近世特别严密界定于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或资本主义隆盛时的欧洲。假如将公元一三〇〇年定为文艺复兴的开始,其后经二百余年,发生宗教改革运动,欧洲变得更加富有近世色彩。制纸、印刷业大盛,火药开始输入,航海术发达,国民主义勃兴,以法国为首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成立。这期间的欧洲肯定不是中世而是近世。把这个时期的社会状态和宋、元、明、清比较,共同称为近世,我不以为是失诸比例。”

“欧洲以公元一七五〇年为中心,发生了工业革命,继而出现以一八〇〇年为中心的法国革命。从此,欧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地域的历史上均未见过的新时代。欧洲的近世清楚的跳过了文艺复兴阶段,飞跃至更高的一个层次。这个讯息的意义与其由欧洲的立场看,反不如由东洋的立场去观察更为清楚。东洋也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但没有这两个革命。从这

<sup>①</sup> 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1页,第239—240页。

<sup>②</sup> 全文55600多字。《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1992年版。中译本选自《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中华书局1993年版。